

歷史的轉向 ——

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*

宣揚歷史的重要性，對原本就浸潤於歷史意識的族群，¹不免有著多此一舉的感覺；尤其出自一位史學工作者的口中，更是有「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」的嫌疑。可是拙文所要析論的「歷史的轉向」(The Historical Turn)，乃係攸關西方現代學術史甫進行中的轉折，其深刻的意涵或許對中國學術的發展，亦將有所啓示。

依字面的意思，「歷史的轉向」不外重新認領歷史知識的價值或歷史探討的重要性。令人詫異的是，西方19世紀方號稱係「歷史的時代」(Age of History)或「歷史主義的時代」(Age of Historicism)，克萊歐這位歷史女神才以學術盟主之姿，睥睨天下，甚至被冠以

拙稿係台灣師範大學主辦「全球視野下的歷史思維教學與研究」歷史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(2015年5月22-23日)之專題演講。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專題演講(2016年9月14日)增訂稿。

- 1 中國與西方向來被視為兩個最具歷史意識的文明，彼此的交流，史不絕書，但卻各自發展了別有特色的史學。Herbert Butterfield, *Origins of History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81), pp. 138-139. 另可參閱杜維運師，《中西古代史學比較》(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8)，第1章，頁2。

「學問女王」的榮銜；蓋自啓蒙運動之後，歷史的原則和歷史的思考，取代了宗教和哲學在傳統思想的位置，主導了學術的發展。² 反觀19世紀的其他社會科學，尚在孕育當中、嗷嗷待哺。試舉史學大宗師蘭克的英國代言人阿克頓為例，他在晚年仍滿懷自信地宣稱：

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，並且是其他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模式與方法。³

又說：

每一門學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，除此之外，它們必須擁有一種可以應用到它們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：歷史的方法。⁴

阿氏的觀點乃是歷史學派回應新興社會科學共通的說辭，例如，蘭克學派在法國的追隨者——瑟諾博司(Charles Seignobos, 1854–1942)也適時刊行了《應用於社會科學的歷史方法》(*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*, 1901)，強力推銷社會科學應採用歷史方法，而致「方法論帝國主義」(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)之譏。⁵

2 攸關「歷史主義」的中文介紹，或可參閱拙作〈歷史主義：一個史學傳統及其觀念的形成〉，收入黃進興，《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》(台北：允晨文化公司，1992；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2)，允晨版在頁11–116，陝師大版在頁3–82。亦收入在本書第一部「歷史主義」。

3 Lord Acton, *Essays in Religion, Politics, and Morality: 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*, ed. J. Rufus Fears (Indianapolis, Ind.: Liberty Fund, 1988), vol. III, p. 621.

4 Quoted by Herbert Butterfield, in his *Man on His Past: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55), p. 1, n. 1.

5 Pim Den Boer, *History as a Profession: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, 1818–1914*, trans. Arnold J. Pomerans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8), pp. 298–299.

顯然對阿氏和瑟氏而言，歷史的思考遠溢於具體的歷史知識。他們的說辭復傳達了下列兩項信息：其一，在世紀之交，史學仍擁有不可忽視的分量。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，卻是道出新興社會科學業已羽毛豐滿，足以振翅長飛。要知19世紀，醞釀中的人文科學皆有所謂的「歷史學派」(historical schools)，例如法律學、經濟學等等，無一例外。但阿氏言說的時間點，適是其他學科趨於圓熟自信、紛紛開展出本門學科的研究取徑，而亟與傳統史學作出區隔的前夕。⁶

約略其時(1880s–1890s)，西方學術界方剛爆發著名的「方法論戰」(Methodenstreit)。若取史學當作思考的主軸，對內則是蘭布雷希特和蘭克史學的對決，前者標榜文化史，以寬廣的研究取向、結盟其他學科，對抗專注政治史、制度史的蘭克學派；⁷對外，則是新興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派的競逐。代表歷史學派的施穆勒於忍無可忍之際，猛烈反擊古典經濟學派門格爾百般的挑釁。雙方纏鬥多時，牽連甚廣，直迄20世紀韋伯的時代，方告落幕；⁸然而該時的激辯卻已敲響歷史學派頹勢的警鐘。

值此風雲變化的分水嶺，阿克頓雖力圖重振史學的餘威，但趨勢顯然對新興的「社會學」(sociology)有利。⁹而蘭布雷希特又另

6 Lord Acton, *Essays in Religion, Politics, and Morality: 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*, pp. 626–627.

7 Karl J. Weintraub, *Visions of Culture* (Chicago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6), chap. 4.

8 Frederick C. Beiser, *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, pp. 521–528. 起初，新崛起的奧地利經濟學派(Austrian school)的門格爾大肆貶抑「歷史方法」於解決經濟問題的有效性，他推崇「公理演繹的進路」(axiomatic-deductive approach)，強調「理論」的重要性；反之，代表歷史學派的施穆勒亟欲維護「歷史方法」的價值，重視經驗的歸納性。

9 Lord Acton, *Essays in Religion, Politics, and Morality: Selected Writings of Lord Acton*, pp. 626–627.

外主張「心理學必須是所有科學史學的基礎」。¹⁰這點，連蘭克學派的欽茲 (Otto Hintze, 1861–1940) 都咸表認同。¹¹他發現晚近新開發的經濟史、社會史皆非系出同門 (傳統的史學)，而是來自新興的經濟學。¹²迄此，連蘭克學派的集大成者伯倫漢 (Ernst Bernheim, 1850–1942)，於其史學方法論巨著的晚期修訂版，都不得不引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，並且承認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。¹³時風易勢，由此可以窺見。¹⁴尤其邁入 20 世紀初期，史學恍若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，節節敗退、割地賠款。反觀社會科學不僅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，並且群起圍攻史學固有的疆域，道是烽火四起亦毫不為過。

首先揭竿而起的，便是美國以魯濱遜 (James Harvey Robinson, 1863–1936) 為首的「新史學」(The New History)。¹⁵他亟倡導史學

10 Quoted in Donald R. Kelley, *Fortunes of History: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* (New Haven and Londo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03), p. 309.

11 Felix Gilbert ed., *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*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5), p. 397.

12 Ibid., p. 377.

13 伯倫漢的《史學方法論與歷史哲學》(*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*) 初版於 1889 年，一直到 1908 年止，曾陸續出版過多次的修改與增訂版。Hans Schleier, “Ranke in the Manuals on Historical Methods of Droysen, Lorenz, and Bernheim,” in Georg G. Iggers and James M. Powell eds., *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* (Syracuse, New York: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, 1990), p. 122.

14 Quoted in Donald R. Kelley, *Fortunes of History: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*, p. 309.

15 James Harvey Robinson, *The New History: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* (New York: Free Press, 1965), chap. 3. 魯濱遜此書初版於 1912 年。至於西方不同樣式的「新史學」，則可參閱 Donald R. Kelley, *Fortunes of History: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*, chap. 12。

與社會科學的結盟，認為社會科學乃劃時代的「新盟友」(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)，涵括人類學、社會學、經濟學、心理學、地理學等等，都是史學研究的新利器。而魯濱遜之所以稱謂「社會科學」為「新盟友」，無非欲與傳統治史的「輔助科學」(auxiliary sciences)有所分辨。¹⁶魯濱遜發覺，即使是當時最了不起、學識淵博的大史家孟森，只緣他對史前考古和人類學一無所知，竟連「冰河期」或「圖騰」均聞所未聞，遑論其他閉塞不敏的傳統史家了。¹⁷此事宛如民初名家錢穆遭受「不通龜甲文，奈何靦顏講上古史」之譏。¹⁸又國學大師章太炎(1869–1936)一度懷疑甲骨文是騙子造假的假古董，竟難以置信有「甲骨文」一事。¹⁹最終亦非得屈服時勢，私下取閱甲骨文。

對應地，該時在中國承西學遺緒者，便是梁啟超的「新史學」。²⁰梁氏坦承：「史學，若嚴格分類，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。」²¹

16 「輔助科學」乃是傳統史學治史的輔助工具，例如：錢幣學、訓詁學、版本學等等。「輔助科學」與「社會科學」之基本差別，前者為史學之工具，幫助辨偽、考訂與解讀文獻；後者則提供史學解釋的理論和方法。

17 James Harvey Robinson, *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*, p. 91.

18 錢穆，《師友雜憶》(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2)，頁142。

19 參見李濟，〈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〉，收入張光直、李光謨編，《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)，頁790–791。

20 請參閱拙作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——試論「新史學」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〉，初載於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(香港中大)，新第6期(1997)：263–285；後收入黃進興，《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：一個批判性的探討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6、2009；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8)，「附錄」，三民版在頁229–267，三聯版在頁217–255。

21 梁啟超，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〉，《飲冰室合集·專集》第23冊(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6)，頁151。

乍聽之下，恍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；但稍加推敲，未嘗不可解作梁氏企圖使中國史學擺脫傳統「四部」之學的糾纏，²²進而加盟西學的陣營。這種覺醒不止限於個別史家，在教育制度亦有所變革。在教學上，1920年起，北京大學史學系即明訂「社會科學，為史學基本知識，列於必修科」。²³

而留美歸國的何炳松（1890–1946）更是鼓吹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不遺餘力，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，可以從他對魯濱遜《新史學》的譯文中求索。《新史學》裡有一小段話恰可作為答案，何氏是這樣翻譯的：

歷史能否進步、同能否有用，完全看歷史能否用他種科學聯合，不去仇視他們。²⁴

這連從未踏出國門的呂思勉（1884–1957）亦深表同感，於評斷乾嘉時期的章學誠（1738–1801）與當今史家的高下時，呂氏如是評道：

他（章學誠）的意見，和現代的史學家，只差得一步。倘使再進一步，就和現在的史學家相同了。但這一步，在章學誠是無

22 傳統中國的學問分類為「經、史、子、集」，目錄學特謂之「四部」。

23 朱希祖，〈北京大學史學系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〉，《北京大學卅一週年紀念刊》（國立北京大學卅一週年紀念會宣傳股編印，1929），頁70–71。又見其為何炳松譯《新史學》所作之〈序〉，頁1–2。

24 魯濱遜著，何炳松譯，《新史學》（北京大學叢書10；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4年初版），頁76。原文見James Harvey Robinson, *The New History: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*, p. 73。該書在美國的社會與學術意義，可參閱Richard Hofstadter, *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, Beard, Parrington* (New York: Knopf, 1968) 的相關章節。

法再進的。這是為什麼呢？那是由於現代的史學家，有別種科學做他的助力，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。²⁵

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，乃是沉寂多時而晚近方才當令的大史家；可是依呂氏之見，其史學造詣較諸現代史學，仍未免略遜一籌。其故無他，現代史學的進步實拜別種科學之賜。²⁶而在諸多科學之中，社會科學尤為「史學的根基」。²⁷同理，在西方，中古史名家赫伊津哈 (Johan Huizinga, 1872–1945) 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去貶抑不世出的文化史家——布克哈特，只因渠無法取資當今的人類學和社會學，以闡釋希臘文明的特質。東西兩相輝映，真是件無獨有偶的趣事！²⁸

事後回顧，自魯濱遜以降，史學門戶大開，社會科學長驅直入史學領域，坐收漁翁之利。況且時值社會更革，歷史的實用性遂受到無比的重視，在美國致有「進步史學」(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) 之稱。²⁹在歐洲，則是由「年鑒學派」(Annales school) 擔綱，其與「社會科學」有近乎天衣無縫的結合。年鑒學派的兩位創始人費弗爾

25 呂思勉，《歷史研究法》(收入《民國叢書》第1編第73冊；上海：上海書店據上海永祥印書館1945年版影印，1989)，頁24–25。

26 同上。

27 呂思勉著有〈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〉(1941)一文。見李永圻，《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2)，頁225。

28 Johan Huizinga, *Homo Ludens: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*, trans. R. F. C. Hull (London and Bost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, 1949), pp. 71–72.

29 請參閱拙著〈歷史相對論的回顧與檢討：從比爾德(Beard)和貝克(Becker)談起〉，原刊《食貨月刊》復刊，第5卷，第2期(1975年5月)：60–75；後收入《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》，允晨版在頁161–191，陝師大版在頁117–145。另可參見Richard Hofstadter, *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, Beard, Parrington*。

(Lucien Febvre, 1878–1956) 及布洛赫 (Marc Bloch, 1886–1944) 均是涂爾幹 (Émile Durkheim, 1858–1917) 社會學的信徒。布洛赫甚至勸勉學生「放棄史學，而改習法律、攻讀考古學位，或學德文與其他」，³⁰ 而且該學派非常重視「比較方法」和「量化技術」。³¹

但是，上述魯濱遜等這般標榜「新史學」者，卻未曾意識到「社會科學」與「史學」潛在的緊張性，似乎仍以「輔助科學」的模式去理解「社會科學」；他們不僅從未覺察出「社會科學」存有鯨吞蠶食的野心，並且無緣目睹日後馬克思 (Karl Marx, 1818–1883) 唯物史觀對史學入主出奴的態勢。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，馬克思史學宰制中國大陸史學多年，已廣為人知。³² 同時，帶有鮮明目的論色彩的「近代化」理論 (modernization)，亦席捲西方及台灣史學界對歷史進程的解釋，使得中、西史學只能朝同一目標邁進：「普遍的 (西方) 合理性」。³³

簡言之，20世紀人類學與社會學的「功能論」(functionalism) 與「結構論」(structuralism) 側重系統的分析，時間因素不受到重

30 引自 Donald R. Kelley, *Fortunes of History: 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jinga*, p. 321。

31 Emmanuel Le Roy Ladurie, *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*, trans. Ben and Siân Reynolds (Chicago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Harvester Press, 1979), pp. 17–18. François Furet, “Quantitative History,” in his *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*, trans. Jonathan Mandelbaum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4), pp. 40–53.

32 早期馬克思史學進入中國，可參閱 Arif Dirlik, *Revolution and History: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, 1919–1937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8)。

33 例如：Marion J. Levy, *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: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* (Princeton, N. 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6)。

視，歷史的縱深與變遷遂不得凸顯。³⁴ 社會科學則是以喧賓奪主之姿出現，因此，受其影響的歷史分析，自然缺乏歷史感。該時的史學則呈現「歷史無意識」(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)的狀態。

尤其在1960年代，「行為科學」(behavioral science)乃是西方的顯學，以布浩士·史基納(Burrhus F. Skinner, 1904–1990)的「行為心理學」作為表率，他大肆推廣及宣揚「行為主義(behaviorism)並非人類行為的科學，而是那類科學的哲學」，一時鼓動風潮，造成另番社會科學的變革。³⁵ 而史學界大力鼓吹運用「行為科學」者，無過於伯克豪爾(Robert F. Berkhofer, Jr., 1931–2012)，他的《以行為進路進行歷史分析》(*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*, 1969)一書，曾流行一時。伯氏將該書獻給「我的歷史女神」(To my Clio)，別有開展另一頁「新史學」的意味。³⁶ 其實，無論倡導同

34 請參較Tom Bottomore and Robert Nisbet eds., *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78), chap. 9, chap. 14; 以及Adam Kuper, *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: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83 rev. & expanded edition), chap. 1–3; 還有Mark Moberg, *Engaging Anthropological Theory: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13), chap. 9, chap. 10。結構人類學落實到史學實踐，最具體的代表便是羅伊德(Christopher Lloyd)的《歷史的結構》。見Christopher Lloyd, *The Structures of History* (Oxford, UK: Blackwell Publishers, 1993)。筆者偶然翻閱1975年9月10日所做的讀書札記，記載閱讀社會學結構功能派大將莫頓(Robert K. Merton, 1910–2003)的巨著*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* (New York: Free Press, 1968 enlarged edition)，其中有一條案語寫道：「function(功能)的概念將會偏於當代社會的分析，而略於歷史淵源的探討。」當時出自一個歷史學徒的直覺，今日回顧，不覺莞爾。

35 B. F. Skinner, *About Behaviorism* (New York: Vintage Books, 1976), p. 3.

36 台灣1960至1970年代攸關行為科學與史學的討論，請參考該時在台灣復刊的《食貨月刊》(1971–1988)與1963年創刊的《思與言》。

社會科學 (social sciences) 結盟，或後來奉行以科學為師，均不脫史學科學化的窠臼。³⁷ 居間，伯克豪爾尤為激進，他主張當前的史學問題不在於該否援用社會科學，而是如何去運用它。他說：

人作為分析的單元，只能透過某些概念架構去研究，一旦取得了人類行為的知識，其他史學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。³⁸

他又斬釘截鐵地表示：

此時此刻，「行為主義」提供史學研究最佳的答案，因為它汲取了人類行為的嶄新知識。換言之，史學必須借重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，若心理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，加上科學哲學裡方法論的自覺。³⁹

遵此，

史家對社會科學最好的服務，便是挖掘事實……供給正確、可靠的事實。⁴⁰

37 簡略的回顧，參閱Lawrence Stone, "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(1976)," in his *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* (Bost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, 1987 revised edition), pp. 3–44; Georg G. Iggers, *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: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* (Hanover and London: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, 1997), part II。

38 Robert F. Berkhofer, Jr., *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* (New York: Free Press, 1969), p. 5.

39 Ibid.

40 Terrence J. McDonald ed., *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* (Ann Arbor: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, 1996), p. 103.